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10 月 24-25 日)

1、美国布朗大学：研究人员展示 AI 工具如何被调整以反映特定政治意识形态

10 月 22 日，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刊登文章《研究人员展示 AI 工具如何被训练以反映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文章认为，研究人员开发名为 PoliTune 的工具，探索如何将大型语言模型（LLM）训练为倾向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显示，用户可以通过训练这些模型的回复，赋予其左翼或右翼的明显偏见。这一发现引发关于人工智能开源应用伦理的担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日益用于生成新闻和社交媒体内容的背景下。尽管训练这些模型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但经过简单微调，就可以轻易改变它们的表现。研究者从政治偏见平台上选择数据，分别创建左倾和右倾的数据集，通过提供两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回应示例，让模型学习理解对立的观点，从而使其未来回答能够展示特定偏见。随后，研究人员利用 GPT 评分和政治坐标评估对微调后的模型进行评估，验证其意识形态偏向。研究表明，微调后的模型能够有效显示出不同政治倾向，且这些模型的回答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能够通过特定问题得以体现。研究团队希望进一步测

试这些微调模型在实际互动中是否能改变公众的意识形态。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不是通过 AI 工具影响用户的政治观点，而是让人们意识到大型语言模型适应性之强，并提升人们对 AI 工具的警惕。

<https://www.brown.edu/news/2024-10-22/ai-bias>

编译：高行健

2、美国《外交政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应被科学家主导

10月11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哈德里安·普吉特（Hadrien Pouget）文章《人工智能太重要了，不能留给科学家》。文章认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不仅需要依赖科学家独立评估，更需要政治领导层积极参与。首先，独立的科学评估无法有效推动国际合作。虽然科学家主导的独立评估对理解人工智能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政策制定者参与，这些评估可能会被忽视。以“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PAI）为例，该组织由独立专家小组撰写报告，但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和背书，最终未能引起各国决策者广泛重视。其次，政治参与是推动全球行动的关键。作者引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成功经验，分析了政治参与如何使科学报告更具影响力。IPCC的报告不仅由科学家撰写，还让政府从报告起草阶段就参与其中，逐字审核并通过。这种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促使各

国决策者重视报告内容，并成为日后国际讨论的基础。最后，科学评估应多元化与灵活化以适应技术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IPCC 等传统长周期科学评估机制可能无法及时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紧急政策需求。故还应推进更加灵活和快速的科学评估机制，促进更快速的国际合作。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10/21/the-science-of-ai-is-too-important-to-be-left-to-the-scientists/>

编译：高隆绪

3、Tech Policy Press：通过第三地外交提升欧盟在 AI 领域的地位

10 月 18 日，Tech Policy Press 网站刊登 AI 政策分析师克里斯蒂娜·福特（Kristina Fort）的文章《通过第三地外交提升欧盟在 AI 领域的地位》。文章认为，欧盟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尚未达到预期水平，缺乏顶级 AI 企业的总部和领先的研究机构。在 2018 至 2020 年期间，美国在 AI 领域投资额是欧盟两倍以上。据预测，AI 有望每年为全球经济增加 2.6 至 4.4 万亿美元价值。因此，欧盟需要在 AI 领域建立更明确的战略地位，而不仅仅是进行技术监管。尽管欧盟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其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仍需提升。企业对欧盟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 AI 产品在欧盟市场的推广。随着新一届欧盟领导层即将上任，欧盟应寻求与那些尚未成为 AI 领域领导者但具

有潜力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国家被称为“第三地”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韩国、加拿大和以色列。这些国家在 AI 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表现出进一步发展的兴趣。与这些国家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欧盟的 AI 产业竞争力，并增强其在全球 AI 领域的影响力。欧盟可以利用其专业的外交团队和软实力，通过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和即将举行的法国“AI 行动峰会”，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并启动新的非监管倡议。这可能包括与“第三地”国家在信息共享、定期会晤、合作举办活动、建立共享计算基础设施和创建联合监管沙箱等方面的合作。欧盟应减少对新法规的依赖，转而专注于实施现有法规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https://www.techpolicy.press/boosting-the-eus-position-in-ai-through-third-places-diplomacy/>

编译：刘嘉滨

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和虚假信息如何影响美国大选

10月1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发该机构技术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尼科尔·特纳·李（Nicol Turner Lee）、达雷尔·M·韦斯特（Darrell M. West）的文章，重点聚焦人工智能（AI）所制造的虚假信息传播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美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极具欺骗性与煽动性的虚假信息。面对这类信息，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开始疲于应对，

不像 2020 年选举时采取了积极的内容审核策略，由此带来的虚假信息泛滥使得公众对真实信息的信任度降低。AI 虚假信息被滥用不仅是个人传播谎言的问题，更是社会信任体系受侵蚀的反映。同时，域外国家利用 AI 干涉选举已屡见不鲜。面对人工智能被滥用现状，在立法层面应要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生成内容的广告或电视广告披露 AI 使用情况，同时对传播 GAI 所生成虚假信息的公司实施高额罚款以遏制其行为。在技术层面应利用数字水印技术用于追踪 AI 生成图像的来源，提高信息的可追溯性。在政策层面则需更多资金支持州和地方选举机构进行事实核查和公众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对虚假信息识别能力，减少 AI 虚假信息传播。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do-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disinformation-impact-elections/>

编译：许泽楷

5、布鲁盖尔研究所：追赶美国还是在技术前沿下繁荣？欧盟的人工智能战略

10 月 21 日，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发布该机构高级研究员贝尔廷·马滕斯（Bertin Martens）撰写的政策简报《追赶美国还是在技术前沿下繁荣？欧盟的人工智能战略》。文章探讨欧盟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投资落后于美国的原因，并分析导致这一状况的市场失灵。文章认为，

欧盟政策制定者希望缩小与美在 AI 创新方面的差距，以加速生产力增长。然而，欧盟现有的超级计算机网络并不适用于 AI 模型训练。与中美的大型科技公司相比，欧盟在硬件设施、云计算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融资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 AI 初创企业依赖美国科技巨头进行合作。文章认为，欧盟的政策更多集中在提升硬件能力上，但忽视了 AI 产业中必要的配套服务市场。AI 初创企业不仅需要计算基础设施，还需要商业模式来生成足够的收入以支付成本。然而，由于欧盟在私募股权和风投市场上的缺乏，许多初创企业必须与美国公司合作才能获得全球市场规模。此外，欧盟的监管不确定性，特别是《人工智能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剧市场问题。文章认为，欧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试图赶上美国，达到 AI 技术前沿，发展自己的 AI 能力；二是专注于在 AI 技术前沿之下发展特定应用的 AI 模型和服务市场。文章建议，欧盟应集中精力发展衍生应用，而不是追求高成本的前沿 AI 模型训练和硬件建设。然而，鉴于 AI 技术前沿的高昂成本及其对全球市场规模的需求，欧盟若要完全自主发展，将不得不承担巨额补贴负担。

<https://www.bruegel.org/policy-brief/catch-us-or-prosper-below-tech-frontier-eu-artificial-intelligence-strategy>

编译：张振

6、英国《金融时报》：人工智能能否帮助非洲缩小发展差

距？

10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该报非洲地区编辑兼专栏作家大卫·皮林（David Pilling）的文章《人工智能能否帮助非洲缩小发展差距？》。文章阐述人工智能（AI）在非洲的应用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了非洲如何利用AI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AI在非洲的医疗、农业和教育等领域的应用进展较快，为非洲带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国家能力、缓解粮食安全与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的机遇。然而，数据安全和数字鸿沟等问题仍然存在，非洲在AI研究和开发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此外，由于非洲地区语言类型多样，为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又一挑战。为让非洲更好地利用AI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文章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投资数据中心和光纤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第二，培养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等AI人才；第三，制定AI政策，以确保其安全、负责任地发展；第四，推动AI本土化发展，开发适合当地语言和文化的人工智能模型。

<https://www.ft.com/content/bdab80fe-e800-4c1c-926d-a6faa750cd57>

编译：赵英慧

7、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探索 AI 战争应用前景，加速推进军事技术创新

10月22日，美国《国防》杂志刊登美国国家国防工业

协会战略与政策高级总监迈克尔·塞德斯（Michael Seeds）的文章《五角大楼理清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未来》。文章视人工智能（AI）为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国防技术，探究其在战争中的应用前景。当前，AI、机器学习与自主技术已成为军事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文章认为，现代战争中，尽管消耗性无人机、自主车辆等 AI 系统尚不能完全替代士兵与精密系统，但已迅速改变战争性质与未来作战方式。为此，五角大楼正加速推进 AI 与自主技术应用。“复制者计划”（Replicator initiative）是美国国防部推进 AI 与自主技术应用的举措之一，由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牵头，计划于 2025 年 8 月底前部署数千个全领域消耗性自主系统。空军领域则将生产数千架大型无人喷气式飞机，与新旧载人飞机协同作战，执行电子战、情报侦察等多种任务，计划在本世纪末前实现全作战能力。根据国防部发布的《2023 年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采用战略》与《国防工业基础人工智能国防应用采纳信息征询书》两份文件，文章强调，AI 应用前景广阔，国防部需明确投资重点与方向，引导企业解决国家紧迫挑战，通过建立融资机制，支持模型与算法及软件系统开发，持续开发和应用新 AI 模型。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4/10/22/pentagon-sorting-out-ais-future-in-warfare>

编译：孙叶秋

8、美国 CSIS：反政府国内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加剧

10月21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布战争、不规则威胁和恐怖主义项目经理兼研究助理赖利·麦凯布（Riley McCabe）的文章《反政府国内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加剧：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文章主要分析针对政府目标的袭击和阴谋的数据集，并得出了三个主要发现：其一，当前针对政府目标的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增加。自2016年以来，出于党派政治信仰而发动的袭击和阴谋急剧增加，很大程度源于阴谋论促使极端分子采取暴力行动。其二，反政府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发生重大转变。过去，大部分针对政府目标的袭击和阴谋由普遍反对联邦权威的情绪激发；如今，袭击政府目标的恐怖分子更有可能受到党派政治信仰驱使，很少与任何团体有实质性联系。其三，针对政府目标的袭击致死率仍然很低。原因可能是政府目标的坚固性以及许多肇事者意图有限且技能低下。为制定更有效反恐措施，政策制定者和执法部门应在以下四点加强努力：首先，继续努力加强对民选官员、候选人、政党官员以及政治工作人员的保护性安全措施；其次，美国政府应与国际伙伴和私营部门一起积极打击在数字平台上宣扬暴力的个人和团体；再次，美国政府、政治候选人和媒体利益相关者必须就选举公正性进行透明沟通，并限制可能引发暴力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最后，美国政府应加强现有系统，以防发生大规模伤亡或引人注目瞩目的袭击。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ising-threat-anti-government-domestic-terrorism-what-data-tells-us>

编译：宋琳琳

9、美国 CFR：欧洲应效仿美国对中国智能汽车大幅提高关税、建立限制性规定

10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丽萨·托宾（Liza Tobin）的文章《欧洲应效仿拜登对中国智能汽车的限制》。文章建议欧盟向美国看齐，在对中国智能电动汽车的关税和限制性规定上采取更严厉措施。在提高关税上，文章建议欧盟效仿美国对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当前将关税提高至45%的计划力度过小，无法达到阻止中国汽车涌入市场、保护欧洲汽车制造商生存的目的。在限制性规定上，作者强调智能汽车的武器化潜力，认为中国可能利用出口智能电动汽车上的车辆连接系统（VCS）和自动驾驶系统（ADS）远程访问车辆并窃取数据，且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已经侵入全球互联网连接设备。因此，欧洲需像美国一样，限制进口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零部件。另外，文章还认为美欧应加快网络安全和联网技术的法规制定，并与日本、韩国等民主国家联合制定相似规则，共同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带来的市场和技术威胁，抵抗中国掠夺性经济政策。防止“华为问题”再次发生。

<https://www.cfr.org/blog/europe-should-emulate-bidens-restrictions-chinese-smart-cars>

编译：孙钰涵

10、美国《外交事务》：美国必须适应军事技术变革

10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美国负责军队发展和新兴能力的前副助理防长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C. Horowitz）的文章《大规模精确作战：技术正重塑战争，美国必须适应》。文章认为，无人机的使用已成为当代战争的全新特点，这将使规模优势在战争中重新变得重要。在过去50年中，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已经由军队规模转向军事技术先进与否。但是，各国对无人机与军事人工智能的投资表明，在当代战争中，军队和军事资产规模正重新变得关键。当代战争依赖大规模部署无人作战系统，这种作战方式同时要求国家追求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在本轮军事技术变革中，即使是小国也可以通过大规模部署廉价武器获得巨大进攻能力，而对此进行防御的成本则高得多。美国国防部正在通过投资“复制者”计划、进行组织调整、设立高速国防实验储备等方式，发展军事人工智能与无人作战系统，以提高其大规模开展精确打击的能力。同时，文章表示，军队必须发展防御大规模精确作战的战略，如发展定向能武器以降低防御方的国防成本。美国必须警惕中国在船舶业、超音速导弹、反舰导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展及其对大规模精

确作战的兴趣，与其远超美国的生产能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battles-precise-mass-technology-war-horowitz>

编译：熊梦溪

11、美国 CSIS：美国大选后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气候合作

10月2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副研究员蒂博·德纳米尔（Thibault Denamiel）和高级顾问威廉·艾伦·赖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的一份报告《2024年美国大选后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气候空间》。报告主要评估美国大选结果的不同可能如何影响美国气候和贸易政策，并提出政策路线图，旨在指导美国和欧盟政策制定者推动长期脱碳措施，并加强跨大西洋气候关系。气候政策方面，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立场截然不同，特朗普强调化石燃料的重要性，主张减少监管并增加国内生产。哈里斯则将气候变化视为紧迫威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和国际气候协议。贸易与国家安全政策方面，过去8年，美国将经济和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混为一谈，对与关键伙伴的关系和绿色技术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政府广泛使用贸易壁垒，而拜登政府则更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商品实施贸易壁垒。多边贸易承诺方面，特朗普政府多次违反WTO规则，拜登政府也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恢复WTO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忽视或削弱WTO作用。这些政策和立场变化将对跨

大西洋贸易和气候空间产生深远影响，塑造未来的全球经济和环境政策。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准备应对更交易性的美欧贸易关系，利用对气候行动的意识形态一致性，以及理解美国国内政治对气候和贸易政策的约束。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ansatlantic-trade-and-climate-space-after-us-2024-elections>

编译：张思薇

12、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谁是美国大选中的中产阶级？

10月2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高级研究员安德烈·佩里（Andre M. Perry）、高级研究助理汉娜·斯蒂芬（Hannah Stephens）与研究员法拉·汗（Farah Khan）文章《谁是美国大选中的中产阶级？》。文章认为，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哈里斯与特朗普争相在政策中提及“中产阶级”，以拉拢这部分人数庞大、经济富裕的选民并获得选票。但大选中的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经济含义，更具有政治、身份与地域含义。作者通过统计学研究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经济标准相对固定，但此类群体在地理区位、红州蓝州乃至族裔分布上具有极大的不平均性；其中，分布在东西海岸都会区、白人群体是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而同时，拉美裔以占中产阶级18.7%的比例成为少数族裔中比例最高的群体，而拉美裔中产阶级多分布在东海岸民主党控制地区。最终，文章认为，当前中产阶级因内部差异大，使得该群体难以有效地在

选举中帮助一方候选人，而该群体因经济、身份上的特殊性则在政策上则更偏向于公平的政策主张，成为大选年值得关注的现象。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arris-and-trump-are-tying-for-middle-class-voters-but-who-really-is-the-middle-class/>

编译：张成昊

13、美国《外交事务》：贸易如何为美国工人服务

10月23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前美国贸易副代表米里亚姆·萨皮罗（Miriam Sapiro）和罗斯福研究所产业政策与贸易研究员托德·塔克（Todd N. Tucker）的分析文章《贸易如何为美国工人服务——即使没有新协议，拜登也取得继任者可以借鉴的进展》。文章认为，贸易政策在美国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原因在于它常与失业、环境破坏以及低劳工标准交织。尽管特朗普政府采取针对中国等国的高关税惩罚性贸易措施，这些关税最终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带来贸易战风险并导致出口需求下降。然而，拜登政府虽延续部分关税政策，但更加侧重通过提升贸易伙伴的劳工标准来保护美国工人利益。拜登政府通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执行机制，推动更严格的劳工标准。特别是推出快速反应劳工机制（RRM），为加强墨西哥工会代表性和改善工作条件提供保障，同时遏制了企业因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将生产外移至其他国家。这使得美国在不平衡的

国际竞争中能够更有效保护本国工人利益。文章认为，拜登政府贸易政策为后继者提供广泛杠杆，应利用美国庞大的进口市场推动更高劳动和环境标准，进一步应对中国在北美的经济影响。文章还认为，未来贸易政策将更关注环境和气候议题，美国在气候行动和可持续能源发展方面具备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潜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north-america/how-trade-can-serve-american-worker>

编译：陈露娴

编译：宋琳琳、孙钰涵、熊梦溪、张思薇、张成昊、陈露娴、李瑾菡、刘嘉滨、赵英慧、张振、高隆绪、高行健、孙叶秋、许泽楷

审核：张丁、郑乐锋、申青青